

論安岡章太郎短篇小說〈水晶鞋〉中的隱喻敘述

楊炳菁/Yang Bingjing；關冰冰/Guan Bingbing

北京外國語大學 副教授、浙江外國語學院 副教授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摘要】

以對戰後日美對比框架的認知為分界線，有關〈水晶鞋〉的研究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雖然兩個階段因時代背景等原因同樣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以小說中的隱喻為切入點而展開的第二階段研究更貼近小說的內容。然而第二階段的研究雖然有著共同的研究前提且將小說中的隱喻敘述納入研究視野，但在對核心內容的解讀上卻存在較大分歧。通過梳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發展脈絡以及更為深入地分析小說中的隱喻敘述，可以發現〈水晶鞋〉所表現的是日本戰敗後被美國佔領期間日本對美國複雜而矛盾的情感。

【關鍵字】

第三新人，〈水晶鞋〉，戰後日本，隱喻敘述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cognition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and American frameworks, the research on *The Glass Slipper*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Although the two stages are inevitably and rationally existing due to reasons such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 the research about metaphor in the second stage appears to be closer to the content of the novel. However, although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study has a common premise and is more objective,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divergenc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By sorting out the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hero and heroine, we can find that the novel expresses the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feelings of Japan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fter the defeat.

【Keyword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ostwar Writers, The Glass Slipper, Post-war Japan,
Metaphorical Narrative

一、前言

安岡章太郎的短篇小說〈水晶鞋〉(「ガラスの靴」1951)是「第三新人」登上日本文壇的重要標誌¹。梳理先行研究可以發現，對其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階段²。在第一個階段，評論家單純聚焦男主人公「我」和女主人公悅子的感情糾葛，認為這是一種只有在徵用屋³這一特殊場所才能存在的純粹戀情。例如吉行淳之介認為〈水晶鞋〉是「具有獨特的童話氣氛和清新的戀愛小說」(吉行淳之介 1956: 219)，而清岡卓行也認為〈水晶鞋〉表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清純」(清岡卓行 1977: 27)。與第一階段肯定〈水晶鞋〉的藝術成就，並將其作為個人情感故事的解讀相對，在第二階段，研究者認為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糾葛很難視為個體層面的戀愛故事，因為「佔領軍的徵用屋，與在那裡工作的日本人侍女戀愛，這一場所及事件本身便已意味著被佔領下的日本、戰敗後的日本，因此可以說這是發生在戰勝國美國與戰敗國日本這一對比構圖之上的故事。」(杉本和弘 1997: 87)簡單對比兩個階段的結論便可以發現，如何看待徵用屋非常關鍵。第一階段的評論家們僅僅將其視為與外界完全不同且沒有任何關聯的世界，因此他們認為發生在徵用屋

¹ 「第三新人」(第三の新人)這一稱謂來源於山本健吉發表在《文學界》1953年1月號上的評論「第三の新人」。目前，「第三新人」一般指1950年代後期，繼「戰後派」(戰後派)之後活躍在日本文壇的一批作家。代表性人物有：安岡章太郎、小島信夫、遠藤周作、吉行淳之介、三浦朱門、曾野綾子、庄野潤三等。其中，安岡章太郎被認為是開拓「第三新人」創作、具有原型意義的作家；而其〈水晶鞋〉則由於顯示出與「戰後派」文學迥然不同的風格，而被視為新文學的預言之作。參考服部達(1955)，〈劣等生、小不具者、そして市民〉，《文學界》，9月号，第6-15頁。

² 所謂「兩個階段」是指大體以20世紀80年代為分界線，對〈水晶鞋〉的評價展示了兩種不同的性質。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主要特征是：以戰後派文學為基準評價「第三新人」，並認為其作品嚴重缺乏政治性和思想性。在此前提下，〈水晶鞋〉被視為是一個具有藝術表現力的、個人層面的愛情故事。20世紀80年代，伴隨日本文學研究界思考框架的巨變，「第三新人」的作品被放到一個更為廣闊的時間維度中進行審視。在這種情況下，〈水晶鞋〉中的愛情故事被看做是一個具有政治含義，反映美國佔領下戰後日本人狀況的隱喻。從這一點來講，兩個階段的不同顯示了以下二元關係：一、對小說的看法是「私—公」的二元關係；二、對小說的評價角度是「藝術性—政治性」的二元關係。

³ 1945年日本戰敗後，為保證佔領日本的美軍及家屬的住房要求，在徵用原日軍建築及其他設施之外，一些個人住宅亦被美軍徵用。本文中的「徵用屋」(「接收家屋」)即指此類被徵用的個人住宅。參考原戸喜代里、木口なつみ、大場修(2015)，〈占領期京都における接收住宅に関する研究〉，《住総研研究論文》，41号，第121頁。

中的「我」和悅子的感情糾葛是一個如童話般的個體層面的故事。而第二階段的研究者們認為徵用屋隱喻了美國佔領下的戰後日本，因此徵用屋內所發生的「我」和悅子的故事就必須在日美對比框架下加以解讀⁴。

雖然如何看待徵用屋在小說中的作用會因為讀者不同而產生差異，但如果從小說內容來講很難忽視徵用屋的隱喻作用。首先，徵用屋的真正主人是美國軍醫克雷格中校；其次，「我」和悅子之間的感情糾葛也的確受到其制約。而更重要的是，小說中出現了「我」與中校「對決」⁵的場景。在敗北後，「我」不僅感到恥辱，同時意識到「對悅子的感情無論多麼強烈也都是無法實現的願望，徵用屋寫著號碼的門牌擺明它已徹底陷入敵手」（安岡章太郎 1971：25）⁶。如果徵用屋如第一階段評論家所認為的那樣只是一個與外界完全隔離的世界的話，那麼只要交待悅子身份以及情感發生地是「徵用屋」即可，完全沒有必要描寫「我」與中校的「對決」。徵用屋「陷入敵手」等表明，至少彼時的「我」清楚地認識到，與悅子的情感走向是由徵用屋主人決定的，而作為徵用屋主人的克雷格中校很明顯象徵了戰後佔領日本的美國。從這一點來講，在日美對比框架下解讀「我」和悅子的故事應該更符合小說內容。

雖然第二階段的研究者通過揭示徵用屋的隱喻性發現了小說中所存在的日美對比框架，但是在這一框架下如何看待「我」和悅子的故事卻是需要繼續解決的問題。有趣的是，對此研究者們產生了較大差異。例如鈴木正和就認為「『我』和悅子的關係就是日本和美國的關係」（鈴木正和 2005:38），〈水晶鞋〉是一個「無法與『他者』相遇相關的、自我意識受到損壞的『我』的故事」（鈴木正和 2005:41-42）⁷。而小野繪理華則認為這是一個由於美國外來權威存在而

⁴ 所謂「日美對比框架」是指日本被美國佔領時期所形成的日美關係。在有關〈水晶鞋〉第二階段的研究中，研究者普遍以上述日美關係為背景，對小說內容進行解讀。例如杉本和弘（1997），〈『ガラスの靴』の時空—「シンデレラ」の影〉，《昭和文学研究》，第34号；鈴木正和（2005），〈『驟雨』と『ガラスの靴』の痛みの行方—愛の不可能性を描いた文学〉，《近代文学研究》，第22号；小野繪理華（2010），〈安岡章太郎の短編小説「ガラスの靴」考察—透明な物語に埋め込まれた屈辱・權威・〈公〉のモチーフについて—〉，《言語情報科学》，第85号。

⁵ 所謂「對決」並非是「我」與克雷格中校進行你死我活的決鬥，而是對小說中「我」主動向中校打招呼這一情景的形象概括。有關此情景的分析將在本文其後的論述中加以展開。

⁶ 本文中所有引自小說的原文均為筆者翻譯。

⁷ 鈴木正和對〈水晶鞋〉的研究首先明確了「我」和悅子的故事不是一個私人層面的清純愛情故事。在此基礎上，鈴木認為〈水晶鞋〉是一部通過「我」來

導致代表日本男性的「我」和代表日本女性的悅子無法自由戀愛的故事⁸。上述兩種不同的結論反映出研究者在認知「我」和悅子以及兩人之間的故事上存在本質差異。具體來講就是：雖然研究者都認為徵用屋代表被美國佔領的戰後日本，克雷格中校代表美國，但在「我」和悅子的問題上，鈴木認為「我」代表日本，悅子代表美國，而小野認為「我」和悅子一起代表了日本。其次，關於「我」和悅子的感情糾葛，鈴木認為〈水晶鞋〉是一個「我」無法去愛的故事，而小野認為〈水晶鞋〉是一個「我」或悅子想愛卻不能愛的故事。

以上情形表明，在日美對比框架下對〈水晶鞋〉進行解讀雖是第二階段研究的共通之處，但研究者在「我」和悅子感情糾葛的問題上並未取得一致。前文雖然提到在日美框架下進行解讀更符合小說內容，但如果同樣從小說內容出發來看待「我」和悅子的感情糾葛就會發現，先行研究並沒有把握小說中「我」和悅子感情糾葛的真實狀態。而且，對「我」和悅子，特別是對悅子的隱喻性的認識還不夠深入。以上兩方面綜合起來會導致誤判小說所要傳達的核心內容。因此，本文將首先以文本分析為基礎，盡可能客觀地勾畫「我」和悅子間真實的情感狀態。其次，在此基礎上分析小說中「我」和悅子所具有的隱喻性。最後，將「我」和悅子的隱喻性與兩人之間的真實情感狀態相聯繫，闡明〈水晶鞋〉真正所要傳達的核心內容。

二、「我」與悅子的情感歷程

在〈水晶鞋〉中影響「我」和悅子情感走向的共有三人：作為當事者的「我」和悅子、美軍軍醫克雷格中校。因此，要想盡可能客觀地勾畫「我」與悅子的情感發展，必須探討以上三者對該情感走向產生何種影響。

反映戰後心理創傷的小說。即小說所要重點描寫的是「我」而不是「我」和悅子的感情糾葛。由於「我」的心理創傷是由日本和美國的戰爭以及戰爭所帶來的後果而造成的，因此其結論可以簡單概括為日本與美國這一對比框架下，戰爭帶給「我」的心理創傷。參考鈴木正和，〈『驟雨』と『ガラスの靴』の痛みの行方--愛の可能性を描いた文学>，第 29-44 頁。

⁸ 小野繪理華同樣不認為「我」和悅子的故事是一個具有某種童話性質的清純的、屬於私人領域的戀愛故事。但小野認為，小說的重點在於表現「我」和悅子之間所發生的感情糾葛根本無法從個人層面加以解決，而是完全受日本戰後的社會狀況所左右，具體來講就是由美國所決定的這一狀況。因此，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小野結論的話，那便是：在日本與美國的對比框架下，〈水晶鞋〉描寫了權威美國與屈辱日本之間的相互關係。參考小野繪理華，〈安岡章太郎の短編小説「ガラスの靴」考察—透明な物語に埋め込まれた屈辱・権威・公のモチーフについて—〉，第 233-249 頁。

首先來看小說中有關「我」的描寫。〈水晶鞋〉雖然清晰地描寫了「我」對悅子的癡迷，但梳理這段情感便可發現，「我」對悅子的感情其實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我」與悅子初次相遇是「我」去中校家送獵槍用子彈的時候⁹，身為女傭的悅子接待了「我」。此時的悅子「看著我，像偷偷放過屁的人一樣，露出了害羞的笑容」（安岡章太郎 1971：9）。「害羞的笑容」完全可以理解。悅子是女性，而且是在招待初次見面的「我」，因此露出此種笑容應該很自然。但那笑容在「我」看來「像偷偷放過屁的人」便會讓人產生不良的感覺。因為在別人面前偷偷放屁本就不夠高雅，甚至可以說是不懂禮貌，而在做完不禮貌的行為後還笑更會令人感覺卑俗。因此，儘管「偷偷放過屁的人」究竟如何笑不得而知，但那笑容肯定不是什麼清純而陽光的笑容。接著悅子「笨拙地握著火柴」為「我」點煙，此時她顯出「奇怪的柔弱」（安岡章太郎 1971：10）以及「十分認真的表情」（安岡章太郎 1971：10）。悅子的動作讓「我」突然覺得「她或許出身在一個不錯的人家」（安岡章太郎 1971：10）。「出身在一個不錯的人家」可以說是對悅子的肯定，但由於這是從劃火柴這個動作中判斷出來，因此可以說在此之前，悅子給「我」的印象應該是出身貧苦人家，且並不高雅。整體而言，這次見面讓「我」覺得悅子是「一個缺乏魅力的人」（安岡章太郎 1971：10），而「我」之所以接受其邀請去徵用屋則是因為，「與只有硬板凳的學校相比那裡要好的多」（安岡章太郎 1971：10）。

從兩人初次見面來看，「我」不但沒有對悅子一見鍾情，甚至覺得她「缺乏魅力」。這就是說在初見悅子時，「我」根本沒想過要與她戀愛，至於答應去徵用屋也不是為了見悅子，而是為了自己的睡眠。

「我」對悅子的情感發生變化是在兩人初次見面後的一周。悅子因為生病穿了件印有網球拍圖案的睡衣，「我」嘲笑那太過孩子氣並由此聊起小學時暑假的情形。當悅子錯將暮蟬認為是鳥時，「我」愉快地放聲大笑。但悅子卻靠在「我」的肩膀上哭起來，「我」在手足無措之際邊安慰她邊將其抱在懷中。而就在此時，悅子身上的氣味讓「我」意外地感覺她是個女人，於是「我」吻了她的耳垂。被吻的悅子就那麼躺在「我」的懷裡，這一反應令「我」事後感到不安，覺得「自己所為十分卑劣」（安岡章太郎 1971：12）。「我」之所以會產

⁹ 在〈水晶鞋〉這一小說中，對男主人公「我」的經歷、家庭等個人信息並沒有做任何交代。小說只寫到「我」每天晚上在位於日本橋附近的 N 獵槍店值夜班，白天則到學校裡睡覺。至於「我」到克雷格中校家送獵槍用子彈則屬於臨時被安排的工作。參考（安岡章太郎 1971：8-9）。

生卑劣的感覺，當然是因為覺得自己不該對一個「孩子」做出親吻的動作。這表明，雖然「我」對悅子的情感開始發生改變，但事實上「我」依然認為悅子身上更多的是「孩子氣」。

「我」對悅子的情感發生質變是在已經習慣去徵用屋之後。「我漸漸變得厚顏無恥。早上，工作一結束便立刻趕往悅子那裡，沖完澡，躺在起居室長椅上睡上一覺不知何時成了習慣」(安岡章太郎 1971：14)。此時的「我」雖然有「成為小偷的奇怪感覺」(安岡章太郎 1971：14)，但一覺醒來，喝著悅子沏的咖啡便會說「水有點多呀」(安岡章太郎 1971：14)。睡醒一覺的「我」儼然如徵用屋主人般指指點點，與此同時，「我」看著坐在地毯上看書的悅子，「恍惚間覺得她就是一直生活在這個家的姑娘」(安岡章太郎 1971：14)。「我」對悅子的這種錯覺非常重要。因為正是在該錯覺產生後，「我」才意識到自己對悅子的感情有可能是戀愛，而這時的悅子「容貌完全變了」(安岡章太郎 1971：15)。悅子的容貌不可能發生變化，發生變化的當然是「我」的感受。那以後「我」變得「不能沒有悅子，和悅子無關的所有東西看上去都很無聊」(安岡章太郎 1971：18)。毫無疑問，此時的「我」已經徹底愛上了悅子。

正當「我」與悅子愉快相處時，中校夫婦提早歸來¹⁰使情況發生重大轉變。「我」與中校不期而遇，「我」雖有心與之一決高低，但由於太緊張或者太心虛，竟然在午後兩點對中校說「早上好」(安岡章太郎 1971：24)。在中校沒有回答並用可怕的目光看著「我」時，「我」的心理防線瞬間崩潰並落荒而逃，並產生了無法形容的屈辱感和自我厭惡感。而當「我渡過暫且把悅子忘掉的一天」(安岡章太郎 1971：25)後發現，「對悅子的感情無論多強烈也無法實現，徵用屋寫著號碼的門牌擺明它已徹底陷入敵手」(安岡章太郎 1971：25)。與中校「對決」失敗後，「我」認識到自己與悅子情感中最大的障礙就是中校。然而在中校面前「我」已徹底敗北，毫無還手之力，因此自己無論如何都得不到悅子。正當「我」因敗北陷入絕望之際，悅子來到獵槍店告知中校夫婦又去了日光旅遊。悅子到來不僅讓「我」重燃希望而且確信「和這個女人再也不分開，她和我融為一體的時刻已經到來」(安岡章太郎 1971：28)。可是悅子出人意料地拒絕了「我」。這讓「我」憤怒之極，甚至有將悅子殺死的衝動。衝動過後，「我」開始回憶兩人的交往，並意識到「悅子其實只不過是個少女」(安岡章太郎 1971：29)，「我」正在失去所有」(安岡章太郎 1971：29)。與悅子分手，「我」

¹⁰ 小說中克雷格中校夫婦原計畫去安加爾島度假三個月，但實際上他們比原計畫提前一週回到日本。參考(安岡章太郎 1971：24)。

依舊在獵槍店孤身一人值班。但「我」還是會「緊握電話，把聽筒放到耳邊一直等」(安岡章太郎 1971：30)。悅子的行動讓我明白，「我」其實一直被悅子所「蒙蔽」，與她的感情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但即便如此，「我」依然抱有一絲希望，等待悅子打來電話。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我」的情感經歷了「初見悅子無動於衷」、「愛戀悅子無法自拔」、「遭遇中校戀情受挫」、「徹底分手心存希望」幾個過程。因此，儘管小說極力描寫「我」對悅子癡迷，但準確地說，「我」對悅子的情感並非是一個單一的狀態。

在梳理了小說中有關「我」的描寫後，再來看有關悅子和中校的描寫。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水晶鞋〉的敘述者是第一人稱，小說中所有涉及悅子和中校的描寫均是通過「我」來完成的。因此，在分析悅子和中校如何影響情感走向時，只能借助「我」的描述，這也是為何要將悅子和中校放到一起加以討論的原因。首先來看「我」眼中的悅子。雖然小說多次描寫悅子給「我」做吃的，和「我」玩遊戲，並在晚上給「我」打電話，煲電話粥，但這些無一不是「我」的敘述。因此，悅子對情感的態度不過是「我」的判斷而已。至於悅子是否想與「我」相戀其實不得而知，因為在小說中悅子從未說過類似於要與「我」相戀的話。關於這一點尤其可以從悅子最後來到獵槍店卻拒絕「我」的行動中得以說明。以為悅子來獵槍店是在投懷送抱僅僅是「我」的判斷，而從悅子拒絕「我」，以及分手後再無聯絡來看，無論如何都很難讓人感到悅子想和「我」相戀。而小說中有關中校的描寫可以說更凸出了「我」作為敘述者的這一特點。與中校不期而遇後，「我」試圖以對等的姿態與中校交流，但最終卻在中校的注視下落荒而逃。面對「我」莫名其妙的問候，中校的確沒有開口，還「一臉不解地歪著那張長有粗眉的威嚴面孔，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安岡章太郎 1971：24)。然而不論是「威嚴面孔」還是「狠狠地看了我一眼」都是通過「我」敘述出來的。也就是說，這些有關中校的外貌以及表情的描寫其實都出自「我」的觀察和判斷。因此，中校的態度只是「我」的一種感覺，甚至可以說是「我」對中校的想像。事實上中校雖然是小說中影響「我」和悅子情感走向的人物之一，但其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我」每天到徵用屋和悅子在一起。因為「我」看到中校時，他正在家門口指揮從車上搬行李，這表明中校或許剛剛度假歸來。其次，悅子來獵槍店找「我」時也絲毫沒有提及中校對兩人的態度。因此，所謂中校對「我」和悅子情感走向的影響其實更多地來自「我」對中校的反應。

梳理小說中影響「我」和悅子情感走向的三個人物後可以發現，較之悅

子和中校，「我」才是真正對這段情感走向起影響作用的人。由於小說並沒有出現悅子想和「我」戀愛的描寫，因此不能得出悅子想戀愛卻不能自由戀愛的結論。而與此相反，〈水晶鞋〉卻傳達出「我」想自由戀愛並加以實施的資訊，只不過在這種單向性的戀情中，不僅充斥著「我」的個人想像和誤判，而且最終也以失敗告終。由此可見，〈水晶鞋〉並非是一個「我」或悅子不能自由戀愛的故事。

三、「我」對悅子情感的實質

通過梳理〈水晶鞋〉中的情感脈絡可以發現，該情感其實是「我」對悅子的單向性情感，而「我」在這種單向性的情感中還經歷了「初見悅子無動於衷」、「愛戀悅子無法自拔」、「遭遇中校戀情受挫」、「徹底分手心存希望」四個階段。通過閱讀可以直接發現，從第二階段到第三個階段是由於中校歸來，「我」與之進行了「對決」，從第三階段到第四階段則是因為悅子拒絕了「我」對其身體的要求。但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轉變卻並不那麼清晰，然而這卻是十分重要而關鍵的問題，因為只有探明「我」為何會從「初見悅子無動於衷」到「愛戀悅子而無法自拔」的具體原因才能揭示「我」對悅子情感的實質。

如前所述，「我」對悅子的情感發生質變是在「我」習慣去徵用屋後。而在此之前，「我」認為悅子「是一個缺乏魅力的人」。所謂「缺乏魅力」當然是指缺少作為女性的魅力。這也就是說，雖然悅子是年輕異性，但「我」在與其接觸之初卻並沒有感受到來自異性的吸引。不僅如此，「我」甚至以「偷偷放屁」之後的那種笑來形容其笑容，可見「我」對悅子並未產生什麼好感。然而這種情形到了故事中間卻發生逆轉，「我」不但愛上悅子，而且變得離不開悅子，甚至在獵槍店值夜班時也會焦急地等悅子打來電話。通過考察小說內容可以發現，造成此種逆轉的原因並不在悅子本身。儘管「最初的印象和現在相比，悅子的容貌看上去完全不同」（安岡章太 1971：15），但很顯然悅子不可能在容貌上發生什麼實質性的改變。而外貌沒有發生變化的悅子其實在與「我」交往的過程中也不是那種異性間的交流。

一過半夜 12 點，日本橋也安靜下來。

有時急速駛過的汽車引擎所發出的聲音可以一直傳到很遠。

「怎麼了？」

我將汗涔涔的聽筒換到另一隻手，腳搭在桌上，一邊扭動靠在椅背的肩膀一邊聽悅子從床上打來的電話。

「啊，想看熊呀！你有沒有見過熊擔著魚走？」

「沒有啊。」

「你答的可真無聊呢。熊真好啊！聽說熊可以和人說話，真的嗎？」

「不知道。」

「可你不是說老家是北海道嗎？那還不知道呀？」

(安岡章太郎 1971：7-8)

以上是〈水晶鞋〉開頭的部分。小說在這裡並未對男女主人公的身份以及兩人之間的關係加以交代。當然，通過閱讀其後的內容可以知道，此時的「我」已經不能沒有悅子。不過即便僅從上面的內容來看，「我」和悅子已經遠遠超出了普通朋友的關係。因為如果兩人只是普通男女朋友的話，「我」應該不會知道悅子這樣一個年輕女子是躺在床上給自己打電話。而從「我」接電話時的動作也可以推測出兩人的通話已經持續了相當長時間¹¹。深夜 12 點，女主人公躺在床上給男主人公打電話，且通話時間較長，小說開篇所提供的資訊為讀者勾勒出一個戀人間親密交往的情景。既然如此，兩人的通話通常應是那種傳達相互情感的內容。然而，閱讀上面這段內容就會發現，悅子說話時雖不乏撒嬌的語氣，但在內容上卻完全是在描述童話故事而與傳遞情感無關。悅子的這一舉動顯然有悖情侶間的一般情況。而從「我」冷淡的回應中亦可發現，悅子的這些話應該不是什麼戀人間為增進相互情感而採取的心知肚明的小把戲。因為如果「我」明瞭這是悅子在傳達愛意的話便不會僅僅敷衍到「沒有」、「不知道」。小說開頭這段打電話的描寫某種意義上就是「我」和悅子交往時的一個縮影。也就是說白天在徵用屋中，「我」基本就是「配合悅子玩兒童劇」(安岡章太郎 1971：15)，而到了晚上，當悅子打來電話，兩人也絲毫沒有戀人間的情感交流。

既然造成「我」對悅子情感逆轉的原因不在悅子本身，那麼就只能從悅子以外的其他因素加以尋找。通過有關情感脈絡的梳理可以知道，「我」對悅子的情感發生質變時，與之前最大的不同在於「我」每天下了夜班都會以小偷的心態去徵用屋。在那裡，悅子給「我」提供了舒適的睡眠環境，還會給「我」

¹¹ 兩人通話時間相當長這一點可以從「我將汗涔涔的聽筒換到另一隻手」這一描寫中看出。通常電話聽筒在握了很長時間後才會變得「汗涔涔」，而在長時間握電話聽筒時也需要變換握有聽筒的手以緩解疲勞。

煮咖啡、做吃的，和「我」玩遊戲；而「我」則在一覺醒來後如男主人般指手畫腳，甚至產生悅子「就是一直生活在這個家的姑娘」（安岡章太郎 1971：14）的錯覺。如果說悅子的容貌、與「我」的交往方式並未對「我」的情感變化產生某種影響的話，那麼造成「我」對悅子情感發生逆轉的原因就只能歸結於這些外部因素的變化。鈴木正和曾這樣分析：「產生悅子『就是一直生活在這個家的姑娘』的錯覺，和這樣的悅子做遊戲，讓『我』感到悅子是自己的所屬物。這也可以說，『我』試圖盜取被美國佔領的日本房屋，包括其中被美國化的姑娘。」（鈴木正和 2005：40）雖然悅子是否被美國化不得而知，但被美國佔領的日本房屋在小說中顯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因為上述那些外部變化只有在徵用屋中才能得以實現。所謂徵用屋就是鈴木文中提到的「被美國佔領的日本房屋」。由於是被美國佔領，因此徵用屋內的所有東西都烙上了中校所代表的美國印記。這樣一來，「恍惚間覺得她就是一直生活在這個家的姑娘」就變得異常重要，因為這意味著在「我」看來悅子也是屬於美國的。從這一點來講，「我」對悅子情感的逆轉其實來自於悅子身上的美國標籤，這些標籤不但讓悅子的容貌在「我」眼中變得完全不同，而且悅子本人也從一個毫無魅力的人變成了「我」癡迷的物件。換句話說，「我」對悅子的情感之所以產生質變，歸根結底是緣於「我」對美國以及美國事物的嚮往¹²。

論述至此可以明白，雖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和悅子演兒童劇、晚上在電話中相互通話也毫無意義，但「我」依然「不能沒有悅子」。這是因為，與實質性的精神交流相比，悅子身上的美國標籤對「我」來講更為重要。對悅子身上美國標籤的嚮往導致了「我」與中校的所謂「對決」。因為如果「我」只是想得到悅子本人的話，那麼中校與這段情感應該毫無關係；但如果「我」

¹² 對美國以及美國事物抱有嚮往之情並非「我」所獨有，某種意義上這是日本戰後普遍存在的社會風潮。關於這一點可以從小說中有關塙山的描寫中得到佐證。在小說中除「我」、悅子和中校外，還對一個名為「塙山」的男人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描寫。塙山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實在感到自己掌控不了與悅子的關係，因此便向其請教，而塙山則給了「我」不明就裡的指導。對於這一人物，小說寫到：「雖然他是一個全身皮膚長著讓人覺得不乾淨斑點的男人，但他絕不讓鬍子在臉上生長，也不穿滿是污垢的襯衣。（中略）他穿著粉紅和黃色相間的橫條紋短襯褲，要和別人說話時便褪下褲子給人看並說到『這可是美國製造』，並以此為生活方式。」（安岡章太郎 1971：21）褪下褲子給人看並強調是美國製造明顯反應了塙山認為自己穿著美國製造的東西可以抬高自己的心態，這反映了當時處於戰後時期的日本人對美國以及美國貨的嚮往。因此，小說中「我」因悅子身上的美國標籤而對沒什麼魅力的她產生感情便沒有什麼奇怪，因為這恰好契合了當時的社會風潮。

想得到擁有美國標籤的悅子的話，那麼中校就變得十分重要。因為身為徵用屋主人的中校掌控著包括悅子在內的徵用屋的一切，「我」要想得到這樣一個悅子便必須與中校正面相對。這在某種程度上講就是，對「我」來講中校比悅子更重要，也正是由於中校的重要性使得「我」在其面前敗北後能夠暫時忘掉悅子。暫時忘掉悅子說明「我」在落敗後所產生的屈辱感和自我厭惡感並非來自悅子本人，而是來自中校。其原因便在於「我」那麼嚮往美國甚至因為美國標籤的存在而喜歡上本沒有什麼魅力的悅子，但作為美國代表的中校卻對「我」橫眉冷對，這應該讓「我」覺得自己很賤很無聊。也就是說「我」的屈辱感和自我厭惡緣於「我」對美國嚮往的心理受挫。

在那之後，雖然「我」因悅子來到獵槍店而重燃希望，但其拒絕和離開讓「我」意識到自己對美國嚮往的不切實際和徹底失敗。但即便如此，「我」還是會「緊握電話，把話筒放到耳邊一直等」(安岡章太郎 1971: 30)。這表明，儘管「我」意識到嚮往美國不切實際，但依舊無法放下這種嚮往。而這一動作也形象地刻畫出「我」對美國矛盾而複雜的心態。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明白，造成「我」對悅子情感發生質變的原因在於徵用屋帶給悅子的美國標籤，該情感的實質是「我」對美國以及與美國相關事物的嚮往。但與中校「對決」以及被悅子拒絕後使「我」意識到，嚮往美國是不切實際的，然而即便如此，「我」依舊無法放下此種嚮往的心情。由於嚮往美國而愛上帶有美國標籤的悅子，姑且不論這能否真的叫做「愛」，但通過前文可以知道，「我」的許多行為不僅是在遇到帶有美國標籤的悅子後發生改變的，而且「我」也在不斷地分析悅子。這說明「我」清楚悅子是他者，而且也努力瞭解這一他者。雖然最終「我」沒有得到悅子，但〈水晶鞋〉絕不是一個「我」無法與「他者」相遇相關的、自我意識受到損壞的「我」的故事」(鈴木正和 2005:41-42)。

四、〈水晶鞋〉中的隱喻敘述

梳理〈水晶鞋〉中的情感脈絡，並對其實質加以分析後可以看出，在這個表面看似童話般的戀愛故事背後隱藏著「我」對美國既嚮往又明瞭該嚮往不切實際，以及欲罷不能的矛盾心態。由於第二階段研究者的出發點是日美對比框架，而且中校也被視為隱喻了美國，那麼在此前提下，「我」和悅子也必定具有相應的隱喻性，「我」對悅子的情感自然也就不是個體層面的問題。很顯然，先行研究也意識到這一點，但尚未形成共識。

首先，不管是鈴木正和所認為的「我」代表日本，還是小野繪理華所認為的「我」代表日本男性，至少二者都認為「我」與日本存在某種關係¹³。杉本和弘在其論文寫到：「日本國土中心點的『日本橋』正是『我』的立足點。這或許象徵著『我』與『我』得以立足的日本這一國家之間存在關聯。」(杉本和弘 1997:87)杉本提及的「日本橋」是「我」打工的獵槍店所在地，這一稱謂既是指橫跨于東京都中央區日本橋川之上的橋樑，也是指該橋鄰近地帶。作為橋樑，日本橋最早是在 1603 年開始興建，而自興建伊始，日本橋就不僅僅只是一座橋樑。歷史上的日本橋既是江戶幕府全國道路網建設計畫「五街道」的起點，同時也是日本所有道路的基點。今天人們所看到的日本橋完工於日本收回關稅自主權的 1911 年。從這一角度講，「日本橋」亦可被看作近代日本步入強國的象徵性建築。此外，日本橋上的大型雕塑是麒麟和唐獅子。儘管麒麟作為傳說中的神獸是由中國傳入日本的，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麒麟已成功融入日本文化。因此，「明治時代，麒麟與唐獅子，已經不再有『唐味』，而成為了可以與西方文化對立並存的日本的本土文化象徵」(蘇靜 2017:137)。雖然杉本用「或許」一詞表達「我」和日本之間的關係，但通過考察「日本橋」所具有的種種象徵意味可以明白，在此打工的「我」的確能夠與日本這一國家關聯在一起。此外，小說中的「我」不時以戰爭描寫表達自己的心情。例如，「我」在買完食物後「如同被將軍鼓舞的士兵般意氣風發」(安岡章太郎 1971:23)；與中校「對決」後察覺「徵用屋寫著號碼的門牌擺明它已徹底陷入敵手」(安岡章太郎 1971:25)；面對拒絕做愛的悅子，「像戰鬥中突然改變陣型的艦隊般」(安岡章太郎 1971:29)感到困惑等。以戰爭描寫表達自己的心情自然讓人推測「我」曾有過戰爭經歷，而現在，「我」只能靠在獵槍店打工才能解決住處。與中校夫婦所去的安加爾島是「一個重新喚起戰爭、戰敗等事實的地方」(杉本和弘 1997:87)相似，「我」表達心情時所採用的方式以及目前的窘境，使「我」不僅能夠與日本關聯，更可以被視為經歷戰爭，並在戰敗後陷入極度困境的日本。

不過，從上面的論述中雖可以看出「我」象徵了戰敗後的日本，但卻無法推導出「我」是日本男性的代表，當然，更無法得出悅子代表日本女性或代表美國的結論。那麼，要想正確解讀「我」和悅子之間的故事，分析悅子

¹³ 在鈴木正和和小野繪理華的研究中均沒有明確「我」與日本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係。但正如筆者在「前言」中對兩人研究所進行的總結和歸納所顯示的那樣，鈴木正和是將「我」看作戰後日本的代表，並認為〈水晶鞋〉表現了「我」所受的心理創傷；而小野繪理華則是將「我」看作日本男性的代表，認為「我」和代表日本女性的悅子正是由於美國這一新的權威才無法自由戀愛。

的隱喻性便顯得至關重要。由於悅子是女傭，其行為必然受到中校夫婦的影響和制約，加之她服從于中校並對「我」的身體要求加以拒絕，因此，鈴木正和便認為悅子代表了美國。與此同時，由於悅子僅僅是女傭，即便生活在徵用屋中但仍是日本人，因此，在小野繪裡華看來，「我」和悅子自然分別代表了日本男性和日本女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這些都只是研究者們的推斷，悅子的隱喻性既不表現在性別也不表現在行為，而在於其獨特的身份——美軍家中的女傭。

在表現日本戰敗後美軍佔領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時常出現女傭的形象。例如安岡章太郎的另一部短篇小說〈看屋人〉（「ハウス・ガード」1953）以及能登方惠的《格蘭特高地物語》（『グランドハイツ物語』1991）。女傭形象出現在表現戰後美軍佔領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反映了日本當時的狀況。林壽美子在對小島信夫的小說《美國學校》進行背景考察時提到，當時位於東京練馬區的美國學校以及周邊的美軍家屬宿舍儼然就是一個「微型美國」。宿舍「每家配有一名女傭，高等軍官還會雇管家和司機」（林壽美子 2005：64）這些工作于美軍家屬宿舍的日本人會在上崗前接受會話、禮儀、美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培訓，而在數量上，僅東京練馬區光丘一地的美軍家屬宿舍就曾多達 5000 人。

戰後服務于美軍家屬宿舍的女傭不但數量眾多，而且她們還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與〈水晶鞋〉中的悅子一樣，這些在美軍家庭中服務的女傭都是日本人。儘管她們可以說是最接近美國的一批人，但日本人的身份註定使其無法成為美國的代表。然而對於同時代的日本人來講，她們也註定無法代表日本。在前面提到的小說《美國學校》中就有這樣的描寫：「遠處住宅中，開著電燈的寢室的情形似乎觸手可及，日本女傭照看著幼兒。在參觀者眼中，就連那些日本小姑娘都像住在天堂。」（小島信夫 1971：237）。「就連那些日本小姑娘都像住在天堂」表明，在普通的日本人眼中，服務於美軍家庭的女傭與自己完全不同。她們雖然僅僅是傭人，但與自己相比，由於她們更接近美國，因此成為日本人中的另類。關於這一點，如果閱讀〈水晶鞋〉中有關悅子的描寫也可發現¹⁴。而這種不同於一般日本人的地方正是本文所概括的、悅子身上所帶有

¹⁴ 在小說中對悅子的描寫雖然是通過「我」的敘述呈現，但通過此種敘述可以看出悅子在言談、舉止等方面與一般的日本女性並不相同。例如小說寫到悅子坐在客廳地毯上看書以及按克雷格中校夫人的方法做果凍派（ジェロパイ），並在吃果凍派的時候與「我」接吻的情形。在這些描寫中，悅子的行為均帶有西洋女性所具有的特點。

的美國標籤。這一標籤不僅使「我」產生悅子一直生活在徵用屋的錯覺，更讓「我」對缺乏魅力的悅子產生了「愛」。

由於身份以及服務對象等原因，戰後出現的女傭成為日本社會較為特殊的群體。而在表現美軍佔領的文學作品中，作為特殊群體而登場的女傭則是「具有攪亂性質的人物」(マイク・モラスキー2006:74)，因為「她們一方面凸顯出社會內部的階層差異，另一方面表現被佔領社會的從屬性」(マイク・モラスキー2006:74)。*〈水晶鞋〉*中的悅子可以說就是一個典型的「具有攪亂性質的人物」：一方面她在徵用屋中所過的生活是以「我」的能力絕對無法實現的生活，另一方面對於所服務的中校，悅子則完全是一種唯命是從的態度。而更為關鍵的是，通過悅子，*〈水晶鞋〉*中的「我」過上了像美國人一般的夢幻生活，但與此同時，這也讓「我」瞭解到自己與克雷格中校、與美國間存在巨大差距並產生對美國的嚮往。當然，如果「我」要想實現夢想的話，那麼擁有女傭身份的悅子自然會被「我」視為能夠讓「我」抵達美國的途徑，因此對其產生感情是很合理的。

具有女傭身分的悅子無法代表戰後的日本女性，因為女傭是一個具有特殊性質的群體，雖然她們「艱難進入到『他們』¹⁵中間，但最終不被任何世界所接納」(マイク・モラスキー2006:74)。「不被任何世界所接納」表明，悅子既不能代表美國，也代表不了日本，當然也不可能代表日本的女性。悅子只是「我」認識「美國」這一他者的媒介，而如果悅子不是戰後日本女性的代表的话，那麼，「我」是戰後日本男性代表的這一說法自然也無法成立。

論述至此便可以明白*〈水晶鞋〉*中的中校代表美國，而「我」代表戰敗後的日本。悅子雖然代表不了任何一方，但由於其身份卻讓「我」以為她屬於美國。由於小說主要描寫的是「我」對悅子的感情失敗，因此，所謂小說中的日美對比框架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日美對決，而是日本單方面對這一對比框架的認識。從這一點來講，*〈水晶鞋〉*其實並非表現了日本在美國佔領下所受到的種種屈辱，而是日本對美國嚮往且明瞭此種嚮往不切實際，但即便如此依舊對美國抱有幻想的矛盾性。

五、結語

本文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了「我」與悅子間感情糾葛的實質，並在分

¹⁵ 「他們」指女傭服務對象所在的文化共同體。具體到*〈水晶鞋〉*則可以看作克雷格中校所代表的「美國」。

析「我」和悅子的隱喻性後得出〈水晶鞋〉所反映的其實是日本單方面對美國嚮往且明瞭此種嚮往不切實際，但即便如此依舊對美國抱有幻想的矛盾性。小說中的隱喻敘述決定了〈水晶鞋〉是一部深刻反映日本戰後社會心態的小說。

阿部昭在〈解說 灰姑娘の影子〉中講：「作者似乎在說把一切都歸為戰爭便完結這樣的風潮大肆盛行的時刻裡，文學不可以那樣做。與說不清楚的深刻的『思想』相比，放屁、茅蝸之鳥、捉迷藏對自己來講更有意義。首先，這些東西與『思想』相比不是更長久嗎？這是對流行於當時街間巷坊的『戰後』思想的一種激烈的反諷，從這一角度來看待『戰敗』，安岡章太郎是第一人」（阿部昭 1971：445-446）。事實上，作為「第三新人」的代表性作家，安岡章太郎並非僅僅是對「把一切都歸為戰爭」這種「戰後思想」進行反諷。他更關注的是戰後日本社會所顯示出的種種現象，這是在用另外一種角度思考戰後日本。那麼，如何通過小說所描寫的戰後普通生活去把握背後潛藏的深刻主題，便需要對其中的隱喻敘述加以深刻理解並展開詳細分析。

[本研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名稱：日本戰後「第三新人」研究，項目批准號：2014JJ015]

引用書目

- 吉行淳之介（1956），〈「ガラスの靴」「愛玩」解説〉，安岡章太郎，《ガラスの靴・愛玩》，東京：角川書店。
- 阿部昭（1971），〈解説 シンデレラの影〉，安岡章太郎，《安岡章太郎全集Ⅲ ガラスの靴・悪い仲間》，東京：講談社。
- 安岡章太郎（1971），《安岡章太郎全集Ⅲ ガラスの靴・悪い仲間》，東京：講談社。
- 小島信夫（1971），《小島信夫全集4》，東京：講談社。
- 清岡卓行（1977.8），〈芸術的均衡の美しさ—「ガラスの靴」について〉，《国文学 解釈と教材の研究》，第10期。
- 杉本和弘（1997.2），〈『ガラスの靴』の時空—「シンデレラ」の影〉，《昭和文学研究》，第34号。
- 鈴木正和（2005.3），〈『驟雨』と『ガラスの靴』の痛みの行方—愛の不可能性を描いた文学〉，《近代文学研究》，第22号。
- 林寿美子（2005.7），〈「アメリカン・スクール」の背景〉，《日本文学誌要》，

第 7 号。

マイク・モラスキー (2006), 《占領の記憶／記憶の占領 (鈴木直子訳)》, 東京：青土社。

小野絵理華 (2010. 3), <安岡章太郎の短編小説「ガラスの靴」考察－透明な物語に埋め込まれた屈辱・権威・<公>のモチーフについて－>, 《言語情報科学》, 第 85 号。

蘇靜 (2017), 《知日》, 北京：中信出版社。

参考文献

山本健吉 (1953. 1), <第三の新人>, 《文學界》, 1 月号。

服部達 (1955. 9), <劣等生、小不具者、そして市民>, 《文學界》, 9 月号。

原戸喜代里、木口 なつみ、大場 修 (2015), <占領期京都における接收住宅に関する研究>, 《住総研研究論文集》, 第 41 号。

本論文於 2019 年 9 月 9 日到稿, 2019 年 10 月 15 日通過審查。